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

(1949—1960)

何 新 等 译

黄 巨 兴 校

内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馆



2 037 8239 9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說集

(1949—1960)

何 新 等 譯

黃 巨 兴 校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 年 • 北京

內部讀物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說集

(1949—1960)

何 新等譯 黃巨興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明庄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书号: 11017·133

1963年4月初版

开本 850×1168¹/₃₂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3 千字

印张 10⁵/₁₆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9) 1.40 元

60293/5224
19

前 言

我們选譯这个演說集是为了便于国内史学界了解美国資產階級史学思想正朝着完全否定历史是一門科学的方向演化的情况，和日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工具的趋势。

美国历史协会每年十二月召开全体大会一次，可以說它是对于美国資產階級史学力量的檢閱；历届大会主席就在这个大会上发表演說。历届大会主席都是美国資產階級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們所作的演說，常常是以美国資產階級史学当中的重大問題和史学界的致力方向为其主要內容的。

美国历史协会成員的政治情况相当复杂，如有自命为进步分子的“共和党人”和自称为罗斯福傳統的继承者的民主党人，此外更有不少法西斯分子、麦卡錫的追隨者和三K党人等。

美国历史协会不仅是美国史学界很有影响的組織，同时也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活动的策划者和辯护者的机构之一。它在美国有左右历史研究方向的力量。因此，我們只要看一看十二年(1949—1960)来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說，就可以窺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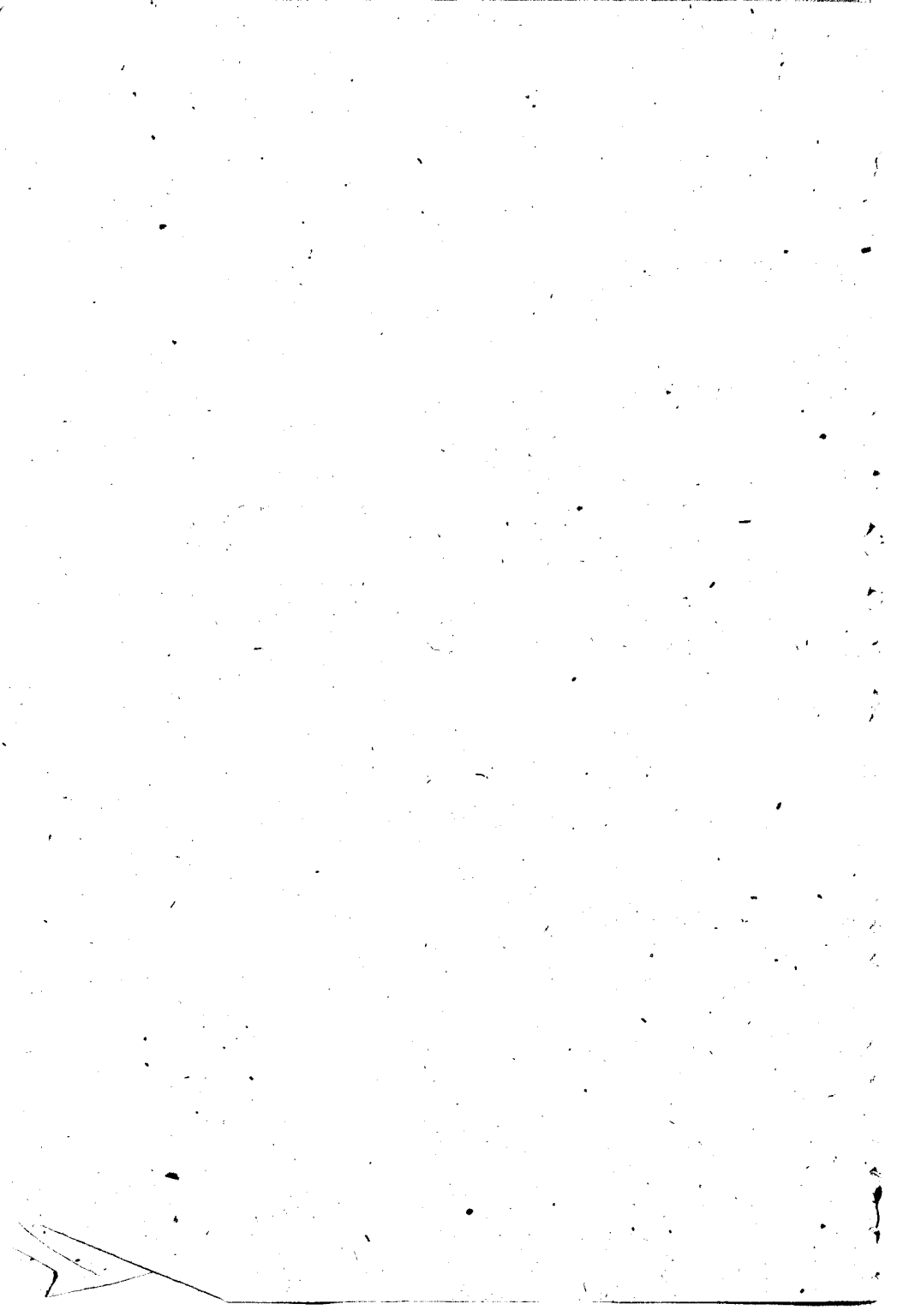
这本集子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譯丛》編輯室組織翻譯的。

編 者

1962, 7, 10.

目 录

李 德: 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3
莫里逊: 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	19
斯开勒: 历史精神的体现者: 弗莱德里克·威廉· 迈特兰.....	42
蓝达尔: 历史学家的身份	68
哥特肖克: 一个处在困境中的历史教授	91
庫尔替: 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人.....	109
桑戴克: 凡是过去的都是对的.....	146
柏金斯: 我们要高高兴兴地做教师.....	172
郎 格: 下一个任务.....	197
韦 勃: 作为高级冒险事业的历史学.....	230
厄文斯: 不做卡彪雷特家的人, 也不做蒙塔求 家的人	253
斯密特: “.....智慧是太少了”.....	279
附录:	
一、有关“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评论》 的资料	310
二、1949—1960 年美国历史协会历届主席简 历及主要著作目录	315



历史学家的社会責任*

李 德

推动我們今晚相聚一堂的力量是一种对历史的共同的兴趣。对我們中間的某些人來說,这种兴趣帶有职业的性质;对于我們中間的大部分人來說,这种兴趣具有文化的性质;而对于我們所有的人來說,这种兴趣則帶有一种我称之为“实用主义”的性质。历史分好几种,有我們所传播的历史,有我們所吸收的历史,也有我們賴以謀生的历史。我今晚就打算談談这头一种历史和最后一种历史以及它們之間的关系,即传播历史的人对于这样一些人——他們过去的經歷是他們目前的行为和未来的計劃与希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的責任。

一开头,最好先解释一下我所說的历史是什么意思。我所說的历史是指記錄下来的或未記錄下来的对人类往昔經驗的記憶。我之所以把历史称为“記憶”,是为了把那些从未被記載下来但对我們个人生活却往往有深刻影响的过去經驗,特別是我們自身的过去經驗,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我并不主张把經驗分成若干种。的确,有时候由于資料的份量巨大,不得不把历史这一門學問分而又分(尽管这种做法从来都不是可取的),区别为知識的、政治的、經濟的、科学的、或美学的各种專門經驗。但是,这种区分当然是人为的和武断的,正如为了便利求知而設想出的无数人为手段中的任何一种手段一样。

* 这是1949年12月29日美国历史协会在波士頓举行年会时宣讀的主席演說,发表在1950年1月号《美国历史評論》上。——校者

对于我們这一行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是一个生計問題。这方面当然也有例外。我們中間有少数人生来命好，父母或妻子很有錢。还有少数象罗德^①这样的人，他們通过自己的努力积蓄了相当的資財，因此得以在后半生追求历史女神时就不必为金錢发愁了。可是对我們这一行的多数人說来，历史却是一种謀生的手段。我們以自己得来不易的历史知識，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下，换取三餐一宿以及些許——一般总是极其微少的——生活乐趣。大致說来，我們大都是教育机构中的教师，我們传播历史的工作都是在課堂中进行的。因此，我們非常重視表示学历的徽章、制帽、礼服和哲学博士学位等等。对那些沒有这类标记而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我們多半抱一种藐視的态度。然而，有一大部分传播历史的工作近来却是职业历史界以外的人們做的。譬如說，我不知道我們这一行中是否有任何人比得上斯溫(Raymond Swing)近年来对美国的一般历史教育所作出的貢獻。可以断言，在我們的課堂中打瞌睡的人总共加起来，和热心傾听斯溫講話的一大群人相比，不过一小撮人而已。

在职业历史学家內部，我們的貢獻还要分为教书和写作两方面。当然，我們中間的大多数人是根本不写东西的——或者更确切地說，是不发表任何东西的。那些动笔写作的人也往往认为写作和口授一样，同样是教学的一部分。我并不否认这点，但我认为下列的說法也一般是正确的，那就是我們的写作有一种与課堂教学迥然不同的目的，而且其服务对象也大不一样。我这里指的是我們中間写点东西的一般人，并不包括我們当中少数拥有广大讀者的人，或者那些主要写教科书和讲义大綱的人，他們的写作大都

① James Ford Rhodes, 1848—1927, 美国历史学家，早年經營煤礦業致富，1885年以后才專門研究历史。——譯者

是教学工作的延續——几乎可以說是課堂工作的沉淀。我个人认为教科书写作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希望这种工作能做得更好。这是大而言之的历史，而大而言之的历史的社会意义要比小而言之的历史大得多。不过，我們大多数人所写的却都是小而言之的历史。我們笔下写出的只限于一两篇专論，其主题的社会意义至少說也比大而言之的历史小許多倍。我們如果能得到一百个讀者的注意就算很幸运的了，而且，即使以这一小群人而言，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讀我們的東西也只是因为他們对作者感兴趣，而不是因为他們对著述内容有什么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仍然自我阿諛地說，这些願意讀我輩著作的人就象酵母芽胞一样，最后可以使整个面团发酵。这样說也許是有道理的，虽然我們可以冒昧地問一問：通过課堂上的口授来散布的类似芽胞是否也具有同等效力呢？这些同心圓式的影响，就象波紋一样，是难以度量的。它們的大小和范围的不同是以最初造成动蕩的投击物的大小而定的。我們或許可以有把握地說，它們是不会对世界較远的海岸造成洪水泛濫的。和閱讀我們的专論的人相比，坐在課堂里听我們讲演的人在数量上要大得多，容易受影响的程度或許也要高得多。我們的讀者閱讀的只是細節問題，而我們的听众可以說是一方面細看了伟大的历史全景，一方面听到了整个文明前进步伐的回音。从历史的社会意义来看，我們以哪一种能力作出的貢獻較大是不难决定的。

可是，非常矛盾的是，我們在史学界的地位和晉級却是取决于我們所写的东西，而不是取决于我們教学的成績。虽然我們循循善誘、天花乱墜地讲课，但和一些精明强干的人竞争起来却无济于事，因为这些人年复一年、照本宣科地讀他們的老讲义，为的是騰出時間来写特殊研究論文——这类論文讀的人是寥寥无几，会长久記住的人更是少得可怜，而且，如果另外有一个同样精明强干的

人在同一研究领域中耕耘得稍为深一些，把泥土篩得更細一些，这类論文就会变得一无用处了。我并不要貶低这种形式的知識活动，虽然我时常认为我們为此付出的代价相当可观。我所不滿的是它被人重視的程度太高了，而那些沿着稍为不同的方向发展他們的志趣和才能的人很少得到承认。优良的教学——至少在大学水平上——相对地說来是得不到承认的，因此，人們也就沒有在发展其潜力方面作过任何真正有系統的努力。譬如說，为了那些不免以当教师来对社会作主要貢獻的人，目前在研究院方面对他們提供了哪些師資的訓練呢？在我前后与之发生过关系的所有大学中，我看到它們大都对教育学院抱蔑視态度。局面看来是这样：虽然師資的訓練在較低級的學校中被看做是必要的工作，但在較高級的学府里，它却純粹变成了被取笑的对象。我似乎在本协会理事会的最近一項決議中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反映，理事会決議中有这样一句話：“审查教科书不在本协会的任务之内。”^①当然應該指出，決議所指的是中学教科书，但是，我回忆起本协会在二十二年前曾經成立过一个委员会，对中学社会科学的教学情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最广泛的調查，并且为此花費了不止三十万美金，当我回忆到这件事时，我不懂为什么我們今天要推卸那时是我們主要任务之一的責任。肯定地說，我們在上面做的事如果要具有最大限度的社会意义，必須反映在下面对广大历史学习者所傳播的历史上。也許从来还没有过象我們现在这样的情况：关于历史哲学談論得这样多，而关于使任何一种哲学实际发生影响的工作却关心得这样少。

本协会以前历届主席中有一位最明智和最风趣的人，他曾經

① 《美国历史評論》，第58卷（1948年4月号），第688頁。

以《每个人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为题发表过一篇主席演说^①。企图用几句话来概括那篇光辉的演说几乎是一种褻瀆。但我认为其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人的日常行动都以他对过去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他目前的行为和将来的计划的应用为根据。他在黑暗中上床就寝时知道太阳一定会象往常一样重新升起，而他自己也将在光明中和它一同起身。他在貯煤箱中装满煤炭或者在油桶里注满油料，是因为他知道随着由来已久的季节推移，在炎夏之后一定会有严冬。他把钱存在银行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随时可以提取。如此等等，举不胜举。人们并没有必要去推究那些明摆着的道理。可是，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和所计划的一切，都是以我们所谓的经验——我们亲身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对人类的经验或自然的观察——为转移的。我们所说的有别于学問的“智慧”，就是用过去经验解决当前问题的能力。正如密尔顿（John Milton）所说的那样，当这种智慧高度发展时，“古老的经验一定获得预言性的性质。”

所以，在我们讲授历史时，我们所教导的是一些就其小宇宙、小天地而言已经是历史学家的人。毫无疑问，虽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却在不断地和批判地检查过去。他们的动机当然纯粹是实用主义的。但这种对过去的检查却实际存在，而这种检查的存在就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待大而言之的历史的态

① 原名是 Every Man His Own Historian，系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在 1931 年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主席演说，载《美国历史评论》1932 年 1 月号，第 221—236 页。贝克尔（1873—1945），美国康涅尔大学教授，早期是特纳的学生，研究边疆问题，后来向美国独立思想的产生和与此有关的欧洲十八世纪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发展，全力提倡具有有机性格的新史学，是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现在主义的代言人。他的主要著作有：《现代的民主》、《较好的世界将新到何种程度？》、《自由和责任》、《每个人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和政治论文集》等。——校者

度。这一事实,在我們讲授历史的过程中,应当成为我們的宝贵财产。

同时也应该指出,普通人总是一心指望上进,指望发迹的。这也许就是一般人可悲地相信受正规教育有好处的基础。他把这看做是一条发迹之道。我們可以尽量推测知識分子对上进的理解,但是这种上进之心无疑是在一般群众之中非常盛行的。或许每一个人对他所理解的上进都有一种粗略的想法。至少他这么想: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有可能改善他目前的处境。这种改善境遇的观点蕴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我們可以用来衡量上进的某种标准。它包含着一种向往的目的以及与此目的有关的手段。这就是向着某种东西前进。

因此,我們作为历史教师就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学生心目中有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1)以經驗为行动的指导;(2)以上进为行动的誘因;(3)以某种标准为衡量上进的尺度。

对于单纯作为古董的过去——如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之流所想象的一个遥远、隔离而又完整的世界^①——感兴趣的人是罕见的。不幸的是,我們在教学中却往往只注意这种罕见的人。希望史学界后继有人的冲动,就其强度而言,几乎是和生物繁殖的欲望差不多的。可是,我們在大学中教授历史时对其更广泛的意义想得未免太少,而对扩大历史学家的队伍这一层却想得实在太多。在我們所教的大学生各班中,打算成为职业历史学家的人,一百个人里面也许还不到一个,但是就为了这么一个人,我們大家往往把另外九十九个人都抛开不管了。我在这里表示关心的正是这九十九个人。至于剩下的那一个,用不着我去操心,在座的

^① 奥克肖特:《經驗及其形式》(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1933),第86頁及以后諸頁。

就有不少是他的保护人。

从长远来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各级教育越来越由公众负担经费,所以这一点也越来越真实。供养诸位的纳税人是讲求实际的。他说不定会提出这样一个老问题:“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我们为本行利益着想不敢回避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的答复导致纳税人得出历史并不能当做涂面包的黄油的结果,他也许就会决定:既然这样,让历史也不要供给历史学家以黄油和面包吧。

五十年以前,有一个富翁在费城近郊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式的公馆。这座建筑物竭尽华丽之能事。连洗澡盆的水龙头都是镀金的——这所公馆里里外外的一切都只是为这位富翁及其子孙的舒适设计的。今天,这所公馆已经被改成为一座化学研究实验室。与此类似,我们为自我享乐而建筑的象牙之塔如果想存在下去,也一定要改成为研究实验室。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

可是,问题还不只此。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及其批评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争执:一派入把过去看成是一种客观的实在,通过辛勤的研究和冷静的判断,可以把它完全如实地描绘出来;另一派人则认为过去只是现在的思想和利益对被记忆的经验所积累起来的资料作出的一种投影。前一派人把过去看成是某种已作成的、完整的和不变的东西;后一派入则好象是通过一面玻璃——这是一面半透明而又反光的彩色玻璃——模模糊糊地观察过去,投在玻璃上的入射光和反射光并不能明确地分清出来。

对于这么一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sub judice),任何人想从这个主席发言台上下一句最后的断语都是非常轻率的。不过,我们

却能够区别开資料的积累和資料的选择与安排，区别开判断的事实根据和判断本身。而且，我們很难否认，每一种选择和每一种安排都构成一种判断，都蕴含着一种判断的标准。在积累資料方面，我想我們也会一致同意下列看法，即应该利用一切精确研究的工具尽可能細致地去伪存真，除掉不可能的东西保留下可能的东西。现在，我們很大的一部分历史研究工作都是放在这一劳动的领域中。我們大多数人都忙于搜集可靠的資料来供綜合的研究。当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着手进行綜合时，困难便开始出现了；而和普通的看法正好相反，我們大多数人惯于从事綜合的地方并不是在所写的书中，而是在从小学低年級直到大学研究院的讲堂里。在那里，通过选择、安排，特别是通过強調，我們把自己的历史图式强加給別人。大家无法否认，我們所强加于人的图式不仅受到我們个人的特质的深刻的影响，而且完全为我們周围的整个輿論的趋势所左右。每一代都必須重写历史，其原因就在此。我們对过去提出的問題不同于我們的祖先，我們所着重考虑的东西是我們的祖先所忽略的东西，而我們所忽略的东西却是我們的祖先认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前輩历史学家的著作从摆在我們的书斋里到被束諸高閣，再从放在我們的頂楼上而下到垃圾箱里，川流不息，无終止之时。如果說我們还注意一下它們的話，那也不过是把它們当做它們那个时代的記錄来看罢了，而不是把它們作为历史学家自称要写的那个时代的記錄来看。少数凭其他条件流传的著作主要也是得力于它們的风格，而不是由于它們的内容。我們必須正視这一可悲的事实，即我們所敝帚自珍的專門論著，就是侥幸逃脫被无情刈割的命运，日后也难免要被当做古董，只是作为有趣的例子来表明二十世紀中叶美国历史学家的古怪思想而已。

对过去的解释經常变更，整个說来，主要并不是由于发现了新

事实,而是由于对旧事实有了新的解说。举一个例,可以比较一下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吉本(Edward Gibbon),或者是比较一下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和马克思。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究竟是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还是作为一个狂热的基督徒,是作为一个善良的自由党人还是作为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不仅对你我来说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对千百万根据他们对过去的解释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念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譬如说,我们人类是仅仅顺从生物学的冲动、注定要与草木同腐呢,或者是根据一种神的意旨由神创造出来,从而我们本身就蕴含着永生的潜能呢?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对我们自身以及社会行为将产生一种深刻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历史便非常明确地和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有抵触。极权主义政府立即认识到这一事实。因此,它们把自己的图式不仅强加在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身上,而且强加于它们的整个文化生活方面。过去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历史完全变了样;今天,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历史——更不用说音乐和一切艺术——和过去相比,也完全改观。我们开始发现自己正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在这里,托马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纳粹教徒、共产党人加上大量无组织的冷嘲派和怀疑派,都在各自提出和鼓吹他们的历史发展的观点。问题甚至比这还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所说的历史不可避免地要表明他们所希望的反映遥远的未来的种种潮流。种子里就蕴藏着最终的果实,或者用一句老话说:“枝弯树必斜”。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痛快的,但我认为却无可争议。我认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就在这里。我所说的社会责任指的是任何人担当着的向现在解释过去的这一工作。我强调把小说家、剧作家、特别是电台评论员都一并包括在内。

假定情形是如此，那么，在人人都称之为民主教育的領域，我們作为历史学家要起什么作用呢？問題并不完全由我們决定。以公立中小学校而言，我們的历史教科书，特别是我們的美国史教科书，是受到相当厉害的控制的。历史学家要想进入这一高度竞争性的和有厚利可图的市場，必須符合于若干标准，同时还要冒很大危险——如果說不用担心秘密警察的來訪，却会遇到甚至更可怕的命运，即他們的心血产儿可能由于得不到支持而夭折。假使有好朋友在掌权机构，資质愚鈍一点并沒有关系，但是观点却万万不能背离正統，至少是在談到民主的优点时必須如此。

但是問題比私人利益还要重大，即使說私人利益是我們个人挂念的中心。問題的实质是，我們是否在原則上接受“控制”这一概念？具体地說，在一个意識形态彼此冲突的世界上，当对于过去趋势的理解是决定现在判断的重要因素时，我們是否认为自己不仅有权把我們自己的解释强加于历史，而且有权通过課堂、报刊和电台散布这种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問題就变成自由与統制这一个大問題的一部分了。

虽然几乎一切其他領域都接受，而且大部分都贊成很大程度的統制，但我們仍然果断地坚持言論和信仰自由。当然，在我們看来凡是违反其他社会考虑的宗教习惯，我們是要加以限制的。我們不允許摩門教徒（Mormon）有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自由，我們禁止印度教徒的寡妇殉死的习尚。当自由的运用威胁到我們的个人名誉、道德标准时，或当自由的运用企图以武力推翻我們的政府时，我們对于言論自由、报刊和电台都要施加限制。但我們是否就此为止呢？如果說我們从最近二十五年的經驗中得到了一点教訓的話，这个教訓就是：語言是一种武器，而且往往是最危险的一种武器。过去的戈培尔博士懂得这个道理，今天的莫洛托夫先生也理

解这一点。1938—1939 年間法国人民惑于巧妙的宣传而淪于精神惶恐和士气瓦解这一事实，肯定是他們在 1940 年一敗涂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是我們，我們可以相信盎格罗-撒克逊种族是不会为这类的宣传所影响的。可是，我們的共产党朋友們显然并不这样想。

我們坚信，真理总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目前该怎么办呢？当弥尔頓写出《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当洛克(Locke)写出《政府論》(Essay on Government)、乃至穆勒(John Stuart Mill)写出《論自由》(Essay on Liberty)的时候，革命的潜在的威胁仍然可以对专制暴政起遏制作用。但是，革命在今天几乎是談不到的事。政府手中的权力实在太大了。栅栏壁垒是騎兵时代的玩意，对付坦克車和机关枪是不頂事的。那些据有机要位置掌权的人不仅能够防止暴动，而且甚至能制止示威。至于說他們对于人們的思想过程也可以控制，这不是沒有理由的。英雄气概不会帮我們很多的忙。

怀着一种梦想，一个人
就能随意横行，爭得王位；
唱着一曲新歌，三个人
就能把一个帝国摧毁。

作曲家喜欢认为这种壮举是可能实现的，可是从歌曲到帝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而这段道路上的障碍是如此可怕，以致在梦想和实现梦想之間会橫隔着許多年的被奴役。

我們目前，正如曼海姆(Karl Manheim)所說^①，生活在一个从放任主义向有組織的社会过渡的时代，在将来的有組織的社会中；

^① 曼海姆：《当代的特征》(Diagnosis of Our Time, London, 1934)，见书中各处。